

20 世纪



东
渐
史

20 世纪

西方哲学东渐史

汤一介 主编

黄见德 著

西方哲学在 当代台湾和

香港

XIFANG ZHEXUE ZAI DANGDAI TAIWAN
HE XIANGGANG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 世纪

西方哲学东渐史

汤一介 主编

黄见德 著

西方哲学在 当代台湾和

香港

XIFANG ZHEXUE ZAI DANGDAI TAIWAN
HE XIANGGANG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和香港/黄见德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12

(20 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汤一介主编)

ISBN 978-7-81064-235-4

I. 西… II. 黄… III. ①哲学, 西方国家-传播-台湾省-研究-现代 ②哲学, 西方国家-传播-香港-研究-现代 IV.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3726 号

XIFANG ZHEXUE ZAI DANGDAI TAIWAN HE XIANGGANG

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和香港

黄见德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三河市富华印装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3.875

字 数 375 千

定 价 41.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20 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编委会

顾 问：张世英

主 编：汤一介

副主编：王守常 胡 军 陈 鹏(常务)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中江	王守常	王红梅	王岳川
邓安庆	白光洁	汤一介	成 芳
成海鹰	孙尚扬	杜小真	宋焕起
杨 河	杨寿堪	张成水	张祥龙
张翼星	张耀南	邹 华	陈 鹏
陈晓明	胡 军	胡伟希	黄见德
黄应全			

内 容 提 要

本书研究了 1949 年以来西方哲学在台湾和香港传播的历史背景;评述了台湾和香港学者传播西方哲学的活动与成果;阐述了这些活动与成果对台湾和香港社会的发展作用;总结了西方哲学在台湾和香港传播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揭示了西方哲学在台湾和香港传播过程中的规律性。

本书作为《20 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的一部分,在展现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和香港传播的真实面貌与发展过程的同时,作出了自己的评判和说明,乃至尝试创造性的诠释。作者所做的工作,对促进海峡两岸学者相互了解,对推动中国的哲学事业共同走向繁荣有着重要意义。

Contents

<i>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A History of the Eastward Permea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i>	
.....	Tang Yijie

**Introduction A Tentative Study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Modern Taiwan and
Hong Kong**

1. Objects of the Research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Modern Taiwan and Hong
Kong
2.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of A Tentative
study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Modern
Taiwan and Hong Kong
3. A Clue to the Writing of the Book

**Chapter I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Spreading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Modern Taiwan and Hong Kong**

1. Soci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Taiwan and

Hong Kong

2. Cultural Thoughts and Their Evolution in Modern Taiwan and Hong Kong
3. Begi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preading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Modern Taiwan and Hong Kong

Chapter II Ancient and Middle Ages Western Philosophies: Introduction and Research

1. Comprehensive Works and Their Achievements
2. New Progress in Chen Kang's Work on Greek Philosophies
3. Research on Plato's Philosophy
4.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es in the Middle Ages

Chapter III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Introduction and Research

1. Hu Qiuyuan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the Modern Times
2. British Empiricists: Introduction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3. Continental Rationalists: Introduction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4. An Exception in the Weaker Regions: Kant's Philosophy
5. Hegelian Philosophy in Taiwan

Chapter IV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Introduction and Research

1. Shen Qingso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ety
2. Researches on Nietzsche's Philosophy and the Introductory Works of Chen Guying
3. Academic Research on Phenomenology
4. The Spreading of Existential Philosophy in a Bout of Enthusiasm
5. Introduction of Neo-Marxism with Attentions from all Parts
6.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Difficult Progress

Chapter V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nd Its Achievements

1.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the Progress of Western Philosophy
2.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the Progress of Philosophy in Some Western Countries
3.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Some Themes of Western Philosophy

Chapter VI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and Efforts at Their Communication

1.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2.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3. The Ongoing Exploration for New Strategies i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in Modern Taiwan and Hong Kong

Western Philosophies

Conclusion Summary and Hopes

1. General Evalu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reading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Modern Taiwan and Hong Kong
2. New Trends in the Spreading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Modern Taiwan and Hong Kong

Bibliography

Index

Epilogue

《20 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总序

—

今天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在五六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有两次重大的外来文化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进程。第一次是自公元 1 世纪以来印度文化的传入。如果不算唐朝传入的景教和在元朝曾发生过一定影响的也里可温教，因为这两次都由于种种原因而中断了。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大量传入应该说是自 16 世纪末，特别是自 19 世纪中叶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两次重大外来文化的传入大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罗素曾在他的《中西文明比较》一文中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1〕上述两次外来文化的传入，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它每一次都使得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

就各国的文化发展的历史看，文化（自然包括哲学）的发展大体上总是通过“认同”与“离异”两个不同的阶段来进行的。“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的一致和阐释，是文化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发展，是对已成模式的进一步开掘，同时也表现为对异己力量的排斥和压抑，其作用在于巩固原有的主流文化已经确立的界限与规范，使之得以定型和凝聚。“离异”则表现为对原有主流文化的批判和扬弃，即在一定时期内，对原有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怀疑，打乱既成的规范和界限，以形成对主流文化

〔1〕 罗素：《中西文明比较》，胡品清译，收于《一个自由人的崇拜》，8 页，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

的冲击乃至颠覆，这种“离异”作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就是文化的转型期。

印度佛教文化，它虽是以一种宗教的形态进入中国，但印度佛教应该说是“亦宗教，亦哲学”，它曾影响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如宗教（包括中国的道教）、哲学、文学、艺术、建筑和广大人民的社会生活，都无不深受印度佛教文化之影响。我们回顾印度佛教传入的历史，也许对我们了解西方文化的传入，起着相互对照和借鉴的作用。

印度佛教（包括它作为哲学思想）传入中国大体上说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

（1）由西汉末至东晋，佛教首先依附于汉代方术（又称“道术”），到魏晋又依附于魏晋玄学。佛教传入中国后，开始的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所讲的内容主要是“魂灵不死”、“因果报应”之类，如袁宏《后汉记》中说：在汉朝时佛教“又以为人死精神不死，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这类思想实为中国所固有，故佛教可依附于此而流行。至汉末魏初，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渐多，其中既有小乘的经典，也有大乘的经典，于是佛教在中国也就分成两大系统流传：一为安世高系，是小乘佛教，重禅法：时《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等已译成汉文。前者讲呼吸守意，和中国道家、神仙家的呼吸吐纳之术相似。后者解释佛教名词概念，似汉人注经的章句之学。《阴持入经》对宇宙人生的学说以“元气”为根本，以“四大”配“五行”，“五戒”配“五常”，并说“元气”即“五行”即“五阴”（五蕴），例《阴持入经》释“五阴种”谓：“五阴种，身也……又如元气……元气相含升降兴废，终而复始，轮转三界，无有穷极，故曰种。”此种以“元气”释“五阴”自与佛理相去甚远，而与当时“道术”颇有相近之处。二是支娄迦谶系，为大乘佛教，讲般若学：初安世高禅法在中国颇为流行，但至魏晋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玄学兴起，而后般若学大为流行。支娄迦谶一系认为人生根本道理最重要的是使“神返本真”，而与“道”合，已见其受老庄影响。支娄迦谶再传弟子支谦译《般若波罗密经》为《大明度无极经》，把“般若”译为“大明”，当取自《老子》“知常曰明”的意思，“波罗密”译为“度无极”即是说达到与“道”（“复归于无极”）合一的境界。这一译经名称已见他使佛教迎合“玄理”。盖因玄学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的问题，而佛教般若学的

中心问题为“空”、“有”，与玄学比较接近，并采用“格义”、“连类”等方法相比附，道安在《毗奈耶序》中说：“于十二部，毗目罗部最多，以斯邦人老庄行教，方等兼忘，故因风易行。”此中之原因，就在于般若学和魏晋玄学颇有相近处，于是两晋的“名士”与“名僧”互相标榜，“玄”、“佛”大有合流之趋势。中国本土学术的变化影响着印度佛教传入的方向，中国本土文化又在吸收着印度文化以滋养自己。东晋初般若学虽有“六家七宗”，但其基本上仍依附于玄学，而后有僧肇的《肇论》出，可以说它既是对魏晋玄学讨论问题的总结，又是佛教中国化的初始。《肇论》借用佛教般若学思想，但讨论的却是中国魏晋玄学的问题，而且文章风格又颇似王弼的《老子指略》和郭象的《庄子注序》，这正体现了两种不同传统文化在互动中的双向选择。

(2) 东晋后，佛典翻译渐多，且系统，已见印度佛教与中土文化之不同，而引起两种文化之矛盾与冲突，并在矛盾冲突中互相影响和吸收。我们可以看到，今日保存之《弘明集》中涉及了当时争论之诸问题，如关于“沙门应否敬王者”、“神灭与神不灭”、“因果报应有无”、“空有关系”以及所谓“夷夏之辨”、“化胡问题”等等之争论。在这些问题之辩难中，既可看到相互冲突处，又可见到相互吸收处。是时名士与名僧又有合流之趋势，许多名士，一方面是朝廷之命官，另一方面又是僧人之良友；许多僧人，一方面隐居山林，礼佛诵经，另一方面又受诏于帝王，而参与政事。这时正是由于佛典翻译日多而出现了佛典经师讲论之盛行，表面上似有印度佛教取代中土文化之形势，但至刘宋《涅槃经》渐流行，特别是四十卷本《大涅槃经》出，印度佛教在中国之形势为之一变。佛教般若学虽说要求“破相显性”，但却是偏重在破相方面，而至宋齐以后有涅槃学之兴起，至梁大盛，我们可以发现涅槃学与般若学有着前后相继的关系。这就是说，南北朝时期在中国流行的佛教在破除一切世间虚幻的假象后，涅槃“佛性”的学说才得以彰显。梁宝亮著《涅槃集解》把当时有关“佛性”的学说列为十种，可见有关此问题的讨论盛况空前，如果说僧肇的《肇论》用佛教般若学讨论的是“玄学”问题（即老庄思想之发展），那么梁宝亮的《涅槃集解》用佛教涅槃学讨论的“佛性”问题，则实与中国传统的心性学说不无关系。这一时期，尽管存在着中华本土文化与外来印度佛教文化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中国朝野从总体上说对外来佛教文化（哲学）采取的是吸收、容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抱着欢迎的态度。可以说这个时期中国文化是处在一个大变动的转型期，是一个从两汉正统经学经魏晋玄学走向佛道的“离异”文化时期。在民间，佛教之深入可以说已代替汉朝以来许多民间信仰。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3) 至隋唐，有长达两三千年历史丰富而独特的中国文化，是否会因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五六百年的流传，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使中国文化变成了印度文化呢？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自隋唐以后，佛教文化反而深刻地受着中国文化，特别是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而逐渐中国化，形成了若干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例如天台、华严、禅宗在佛性问题上，实际上融合了中国儒家的心性学说。如天台之“一心具万法”，华严之“离心之外，更无一法”，禅宗之“识心见性”、“见性成佛”等，上可接先秦儒家的心性学说，下可开启宋明理学（新儒学）之心性学说（或谓“性即理”或谓“心即理”）。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南北朝时引起中印文化严重冲突之沙门应否敬王者的问题已不成问题。佛教主张出家，只能拜佛，不能拜君王和父母，但“忠孝”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礼教之核心部分。而禅宗《坛经》的《无相颂》有“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之语，宋大慧禅宗则有“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大夫等”之论。这几个佛教宗派可说已深深打上中国文化烙印。天台甚至吸收着道教的某些思想，而华严和禅宗无论就内容与方法都与老庄思想（如“任自然”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与此同时，有玄奘大师提倡的唯识学，正是由于它太印度化，在唐朝没有流传多久（大约三十几年）就衰落了。而且更为奇特的是，印度佛教至八九世纪已开始衰落（至14世纪几至湮灭），而此时正是中国化的佛教大大发展的时期，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又于此时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越南等地，而且佛教在朝鲜、日本、越南又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形成有不同特色的佛教。宋理学家们一方面批判印度佛教（特别是“出世”“空无”等思想），另一方面又充分地吸收着佛教中的某些思想因素（“一即多，多即一”，“识心见性，见性成佛”，“顿悟”等等）。故自宋明理学（新儒学）的兴起，从哲学思想上说已经取代了佛教哲学，而佛教大体上成为一种民间信仰，再无理论上的重大建树。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哲学）曾受惠于外来的印度佛教，而佛教文化在中国又得到了发

扬光大；最终中国文化没有被印度佛教所化，相反印度佛教却中国化了。这说明，外来文化的传入与当地本土文化的交流确实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同时也说明，在不同文化之间，特别是有较长历史和丰富文化内含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双向选择问题和异地发展问题。中国文化在印度佛教传入后，从总体上说中国人采取的是接受和吸取的态度，对能与中国文化较好结合的“法华学”（天台推崇《法华经》），“华严学”（华严宗以《华严经》立论），“大顿悟禅学”（禅宗以《金刚般若经》为依据）就得以广泛流传，而唯识学的思维方式是纯印度式的，则难以流行。密教（密宗）虽在唐中期后风靡一时，但也没有能在汉地长期流行。印度佛教在八九世纪开始衰落，至 14 世纪几至湮灭，而却在中国得到了发展，同样希腊哲学也是在传到阿拉伯得到发展，然后又回到欧洲，成为今天世界上的强势文化。所以文化的双向选择和文化的异地发展都说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1〕。

为什么我们要简要地讨论印度佛教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传入中国的历史，这是因为希望能从历史中得到某些借鉴和启示，以便我们在阐述和分析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有一个参照系。

西方文化（景教）早在唐朝已传入中国，后来因唐武宗灭佛而波及景教，此后景教在中国逐渐消失了。而元朝的也里可温教也随着元朝的覆亡而灰飞烟灭了。西方文化真正在中国发生影响是在 16 世纪的明朝末叶，当时传入的主要是西方基督教耶稣会的一些学说，并且也往往是附会于中国传统文化，但西方科技也随之传入，特别是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得（Euclid，约 330~275B.C）的《几何原本》和由李之藻与传教士傅泛际合译之《名理探》介绍到中国，应该说是十分有意义的。至清初因礼仪之争而有所中断，至 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如潮水一般地涌入中国，至今这种“西学”全方位大量的输入，已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必须接受的事实。

文化有种种定义，但无论如何文化包含哲学，就一定意义上说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对一种文化的深层了解离不开去把握或揭示其哲学的内涵。我们要了解中华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国哲学。但是什么是中国哲学？

〔1〕 汤一介：《“和而不同”原则的价值资源》，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695~699 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中国有没有哲学？这都是我们首先要弄清的问题。现在中外学者的大多数不会再说中国没有哲学，也大都认为在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中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但在两三百年前并非如此。从西方说，黑格尔曾提出中国甚至东方没有哲学的看法，认为中国（甚至东方）所有的只是“意见”，“与意见相反对的是真理”^{〔1〕}。黑格尔的看法固然不对，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哲学问题”的资源，这是谁也否认不掉的。但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之前，在中国确实是没有“哲学”（Philosophy）一词。“哲学”一词最早是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借用汉语“哲”、“学”两字指称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学说，中国学者黄遵宪（1848～1905）将这一名称介绍到中国，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如果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大概可以说西方哲学传入之前，在中国还没有把“哲学”从“经学”、“子学”、“史学”、“文学”等等分离出来使它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而“哲学思想”、“哲学问题”的研究往往是包含在“经学”、“子学”等之中来进行的。这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自觉地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研究的对象。在西方，“哲学”是一种“爱智”之学，它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自觉地要求建立解释宇宙人生的学问。从今天看，我们当然可以说有些历史上的学者的著作应该是“哲学”著作，如王充的《论衡》，王弼的《老子指略》，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正蒙》，方以智的《东西均》等等。而且还有分析和总结一个时期思想潮流的论文，如《庄子·天下篇》，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等等。这些著作和论文都有非常丰富的哲学思想内容，但作者作这些书的目的并非纯粹为了把“哲学”作为对象来研究，至少可以说没有充分把它作为独立的学科自觉地进行研究的对象，也没有把其中的“哲学思想”从其他学科全然分离出来。比较严格地说，也许《公孙龙子》或惠施的诸论题可以算是“哲学命题”，而把哲学问题较为自觉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照我的想法，“哲学”应该是从思考某个（或几个）“哲学问题”出发，而形成的一套

〔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在说到东方思想时，他说：“我们在这里尚找不到哲学知识，”他谈到孔子时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97页，1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概念体系，并据概念之间的联系而形成若干“哲学命题”，并在方法上有着相当的自觉，进而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与综合而形成的关于宇宙人生的哲学体系。因此，在中国把哲学自觉地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大体上说是在 20 世纪初。研究 20 世纪西学传入中国的历史，对西方哲学对于中国的影响使中国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及中国哲学相对西方哲学所具有的特点等等问题的研究，无疑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从当时历史进程的情况来看，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大大有利于西方各种文化随之进入中国；同时，一部分中国人也开始感到西方国力之强盛，必与其文化有密切之关系，而哲学是文化之核心，因而开始了对西方哲学的关注。从当时甚至到今天，在西方哲学进入中国后，可以说我们一直面临着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如何对待西方哲学；如何看待我们自己本民族原有的哲学；如何创建中国的新哲学。很自然，中国的学人在这一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在中西哲学剧烈的碰撞时期，对上述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定会存在着不同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在对西方哲学的引进和学习过程中，对待西方哲学可能有三种相当不同、甚至是相互对立态度的派别：激进主义派（也可称之为全盘西化派）、本位文化派（也可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派）、改良主义派（也可以称之为调和中西文化派）。百多年来，在这三派之间，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学术上的冲突，有时甚至表现为政治上的对立，往往把哲学学术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

“中国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中国学者自觉的研究对象应该说是在西方哲学传入以后的事。这和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前中国有没有哲学是两个问题。前面我也明确地讲了，中国自先秦以来不仅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哲学问题”，而且已经显露出来它与西方哲学思想有着非常大的差别。但是，在西方哲学传入之前，我们确实没有把“中国哲学”自觉地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独立地研究，常常是混在经学、子学、史学中来研究，或者是在思想史、学术史等等中来进行研究。我们知道，不是说对某个哲学问题进行了讨论，就可以说建立这门学科了。例如考古学，文物发掘（包括盗墓）、文物的鉴定当然都属于考古学的范围，但仅仅有这些并不等于说就有了“考古学”。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说，西方考古学的“萌芽期”约在 1760 年至 1840 年之间，而中国的“考古学”是在受到西方考古学影响晚到 20 世纪 20 年代才由裴文中、李济等先生建立起来的。又比如说“比较文学”的建立，人们通常

认为是在 19 世纪才建立成一门“学”的。但是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文学的比较”早就有了，例如《文心雕龙·明诗》就对诗人作品以及不同时代的诗风做了比较，其中有一句说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老庄告退，山水方滋。”这里比较了南北朝与魏晋诗风的变化，在魏晋时诗往往是“玄言诗”，而到刘宋之初诗风渐由“玄言诗”变为“山水诗”，这样诗就更接近“自然”了。李达三在《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中说：“作为一门学科而言，‘比较文学’在法国，直到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方告成熟。以此而言，在法国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安培尔（1800～1864）或威尔曼（1790～1867）可被认为真正构想完整的‘比较文学’。”在中国把“文学比较问题”作为一门“学”来研究已是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的事了。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在它之前已经有或长或短的“问题积累”、“思想资源”、“材料的累积”等等的历史，这大概只能说是这门学科的“前史”。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早已有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哲学问题”，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但是自觉把“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作为独立学科来研究应该说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前面我们简略地论述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的某些现象。那么，西方哲学传入中国是否也会发生相同或相似的现象呢？在中外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大概不会出现完全相同的历史现象，但是我们往往也会惊人地发现其间的某些相似之处。对唐朝传入的景教和在元朝流行过的也里可温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16 世纪末、17 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曾把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在明末西方逻辑学也介绍到中国，可以说它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但是如果 we 看利玛窦的中文著作就可以发现，它也有类似早期印度佛教传入时的相似情形。例如，利玛窦为了传教目的，他对当时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采取了“合儒”（说明天主教与儒家学说、中国古代经典有相合之处）、“超儒”（认为西方天主教在某些方面超过儒家学说）、“补儒”（认为天主教和儒家思想多有相通处，但儒家仍可有天主教补充之处）、“附儒”（对天主教义某些方面做了修改以附会儒家传统思想）等等方法^{〔1〕}。徐光启等人的论述之中，从方法上说，不能不

〔1〕 汤一介：《利玛窦汇合东西文化的尝试》，原刊于台湾《中国论坛》，1989 年 3 月 15 日。